



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的结构 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吉林省的调查数据

王胜今, 许世存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社会融入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核心问题之一, 文章关注了吉林省流入人口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认为, 社会融入感是流入者基于自身的融入意愿, 根据融入过程中的客观体验, 而获得的对自身融入状况的全面感受。它包括主观融入意愿、客观融入体验和深化融入决策等三个层次。从宏观制度设置与个体行动参与两个方面探索社会融入感的影响因素, 一方面, 能否拥有居住证或暂住证、是否享有职工医疗保险、子女本地就学及赞助费缴纳情况、工作的时间与强度安排等制度因素影响着流入者的融入感知; 另一方面, 个体的社会参与行动、人际交往行动和回归性行动也会影响社会融入感。

【关键词】吉林省; 流入人口; 社会融入感; 制度设置; 个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4-129X.2013.01.001

【文章编号】1004-129X(2013)01-0005-10

【收稿日期】2012-09-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1 世纪我国人口变动趋势与社会结构变动关系研究(09&ZD022)

【作者简介】王胜今(1954-) 男, 吉林磐石人,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世存(1983-) 男, 吉林长春人,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流动人口规模日益膨胀。“六普”数据显示, 到 2010 年, 我国流动人口高达 2.61 亿, 较 2000 年增长了 81.7%。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的群际互动和融合引发了学界的极大关注, 学者们从社会融入的理论架构、^[1-3]社会融入的过程、^[4-6]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测量及其影响^[7-11]等角度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讨论, 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从目前研究的范围来看, 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针对东部发达地区, 对中西部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鲜有关注。然而近年来, 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流动人口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对这些地区流动人口的融入研究变得非常必要。以吉林省为例, 该省 2004 年流入流出人口总计达 206.2 万, 其中流入人口 22.8 万人。到 2009 年, 流入(暂住)人口达到 44.2 万人, 5 年内增加了 1 倍,^[12]但目前鲜有针对该省(或省内城市)的流动人口融入研究。宋月萍、陶椰(2012)通过对苏州、郑州、中山、成都、韩城、北京等六城市的流动人口融入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情况与城

市变量呈现显著关联。^[13]因此,只有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社会融入的关注,才能全面地了解我国流动人口融入问题的普遍规律。

基于此,本文将以吉林省为例探讨影响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因素。主要分析了“制度设置”和“个体行动”两方面的作用。研究将利用2012年上半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吉林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将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建立省内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模型,分析出其中潜在的“主观融入意愿因子”、“客观融入体验因子”和“深化融入决策因子”,然后分别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2组自变量(制度设置变量和个体参与变量)与3组因子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其作用机制;最后,将依据分析结果进一步讨论,提出促进流入人口社会融入的建议。

二、概念与分析框架

(一)社会融入感的理论内涵

很多学者指出,社会融入感是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的重要内容。莫曼(Moerman,1965)通过田野调查的结果证明,个体的主观认同(subjective identification)而不是各种客观特征是界定群体归属的核心。^[1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现代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社群成员不可能认识他的大多数同胞,然而相互联结的意向却在他们心中。^[15]Gordon(1964)认为社会融入有7个方面,概括起来包括结构性融入和文化性融入,文化性融入便是在价值和心理层面的认同强化。^[16]Bernard(1999)建立了6个维度(归属感、认同、参与、合法化、平等、包容)、3个层次(政治、经济和心理)的分析和测量框架,^[17]将心理因素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Entzinger和Biezeveld(2003)认为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或排斥)对其融入有重要意义,这主要反映在心理方面。^[18]国内学者任远、乔楠(2010)认为自我身份认同、对城市的态度、感知的社会态度等心理感知因素都是影响社会融入的重要方面。^[19]李培林、田丰(2012)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心理接纳和身份认同作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两个核心方面。^[20]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个体的主观心理融入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只有在文化心理层面上融入一个社会,社会融入过程才算完成。^{[1-2][21]}

然而,无论是在概念使用还是在具体内涵上,学界对于社会融入感的理解是多元的。郭星华(2011)使用“社会认同”这一传统社会学概念来诠释流动人口的融入感知,他认为,流动人口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对社会群体本身的认知和评价;二是对于自身与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认知和评价。^[22]雷开春(2011)则认为,流入者的社会认同应该有5个维度:地域认同、文化认同、群体认同、地位认同和职业认同。^[23]崔岩(2012)使用“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来指称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外来人口是否认可自己是“本地人”这一问题上。^[24]宋月萍、陶椰(2012)在研究中用“融入意愿”来说明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过程,他们通过因子分析,将这一概念细化为“主观融入意愿”和“客观融入感受”两个方面。^[13]然而,“认同”与“社会融入”虽然类似,但本质上毕竟有所不同,社会融入意愿也不能完全表达心理社会融入的全部内容。

因此,“社会融入感”指流入者基于自身的融入意愿,根据融入过程中的客观体验,对自身融入状况获得的全面感知。这种感知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对自身社会/文化认同的意愿,又有对当地社会接纳强度的回应,还有在综合评价了若干因素后做出的是否进一步深化融入的决策。

(二)社会融入感的结构剖析

为了探究社会融入感的具体结构,本文对问卷中7个方面的社会融入感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7个问题是:您是否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您是否关注居住城市的变化;您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您是否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自己;您是否感觉本地人看不起自己;如果没有限制,您是否愿意将户口迁过来;您是否愿意在本地长期居住。鉴于这7个问题的方向性不一致,赋值



情况也有差异,要首先将其得分标准化。我们先对第 5 个问题的方向性进行了调整,并对 7 个问题赋予总分为 10 分的标准化分值。通过对 7 个原始变量的因子分析适合性检验,发现 KMO 系数达到 0.828,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相伴概率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sig=0.000), 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具体分析,发现用 3 个因子即可解释总变异的 76.58%, 3 个因子分别解释了 46.48%、18.17%和 11.92%,解释率良好。表 1 给出了通过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之后的结果。

可以发现,前面 4 个问题在因子 1 上的载荷分别达到 0.861、0.876、0.858 和 0.798,这 4 个变量主要涉及流入者的主观融入意愿问题,因此将因子 1 命名为“主观融入意愿因子”,第 5 个问题在因子 3 上的载荷高达 0.97,这一问题主要探讨的是流入人口对本地人接纳程度的反馈,因此将因子 3 命名为“客观融入体验因子”,第 6 个问题和第 7 个问题在因子 2 上的载荷较高,主要涉及流入人口是否愿意进一步加深在本地的融入程度,因此将其命名为“深化融入决策因子”。

表 1 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原始变量	成分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X ₁ :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	.861	.087	.061
X ₂ :我关注我现在居住的城市	.876	.048	.110
X ₃ :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	.858	.118	.116
X ₄ :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	.798	.102	.195
X ₅ :我觉得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方向已调整)	.220	.027	.970
X ₆ :如果没有限制,我愿意把本地户口迁入	.021	.842	.066
X ₇ :我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	.168	.803	-.029

根据 SPSS 提供的因子系数得分系数矩阵,可以计算出每个样本在主观融入意愿因子(F₁)、客观融入体验因子(F₂)和深化融入决策因子(F₃)方面的因子值,计算公式如下:

$$\begin{cases} F_1=0.324X_1+0.323X_2+0.306X_3+0.265X_4-0.140X_5-0.105X_6-0.019X_7 \\ F_3=-0.034X_1-0.066X_2-0.011X_3-0.016X_4-0.012X_5+0.636X_6+0.59X_7 \\ F_2=-0.133X_1-0.08X_2-0.07X_3+0.034X_4+1.043X_5+0.064X_6-0.077X_7 \end{cases}$$

由此,社会融入感是由三方面的结构构成,分别是:主观融入意愿(即流入人口融入本地的意愿强度)、客观融入体验(即在融入过程中感受到的来自本地的接纳和排斥感觉)和深化融入决策(即在综合考虑了多方面因素之后,做出了是否加深融入程度的主观决策)。根据这三方面因素,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影响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因素。

(三)社会融入感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尽管社会融入感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学界对于流入人口的社会融入感影响因素探讨是零散的,本文试图从宏观制度层面和微观行动层面来寻找对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影响因素。

1.制度影响与社会融入感

很多研究者从制度排斥视角来讨论社会融入问题。Alcock(2006)指出,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种种制度设置)会对流入人口融入形成强排斥,只有通过政策行动削弱导致排斥的权力,才能回应这种结构。^[24]在国内,流入人口研究中最被关注的是户籍制度,这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屏蔽”,把大多数流入人口都排斥在本地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外。与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是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25]任远、乔楠(2010)研究表明,是否办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保障性因素与流入者的社会认同及其对城市的态度相关,子女是否能够在本地入学则与自我身份认同有关。^[26]此外,工作制度(包括工作的强度和时间的等)、居住制度(是否在住房上获得政策性支持)等方面也可

能对外来人口的流入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形成如下假设：

假设 1：当地的制度设置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有显著影响，制度设置越积极，则流入者的融入感越强烈。

假设 1.1：能够获得带有户籍性质的政策支持流入者（拥有居住证和暂住证）社会融入感更加强烈。

假设 1.2：能够享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入者社会融入感更加强烈。

假设 1.3：子女能够在本地入学，且可以免交赞助费的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更加强烈。

假设 1.4：工作制度越正规，流入者的社会融入感越强烈。

假设 1.5：能够在住房方面获得国家/单位支持的流入者社会融入感更加强烈。

2. 个体行动与社会融入感

如果说制度设置是宏观环境角度的社会融入感影响因素的话，那么从参与行动的角度考察社会融入感就是一种微观互动视角了。目前对这一视角的关注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第一，社会参与行动的影响。流动人口的活动参与是分析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刘建娥（2010）通过对天津市华章里社区（A 社区）的个案研究，发现当地流动人口社会活动参与度不足，这既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偏见，也影响了移民与本地居民在文化、心理上的融合。^[27]第二，人际交往活动的行动。人际交往对社会融入感的影响是复杂的，郭星华、姜华（2009）指出，此类行动一方面让流动人口获得了社会资本支持，增强了流入者对于本地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目前以血缘和亲缘为主要交际纽带的人际交往活动又会强化其生存的亚环境，阻碍其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26]因此，流动人口的人际交往具有双重性意义。第三，回归性行动。对于流动者而言，至少存在两个可能的认同中心——原住地和现居地，因此，当他们在现居地不被接纳，找不到归属感时，很可能增强与原居地的互动强度来获得补充，这可能进一步降低流入者对于当地的融入感。由此形成如下假设：

假设 2：流动人口的行动对其社会融入感的形成有复杂的影响，异质性的行动会造成不同的社会融入感强度。

假设 2.1：社会参与性行动发生频率越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越强烈。

假设 2.2：基于亲缘、地缘的人际交往越多，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越淡漠；其他性质的人际交往越多，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越强烈。

假设 2.3：与原居地的互动程度越高，流动人口对当地的社会融入感越淡漠。

三、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文选用 2012 年上半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吉林省八市一州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探究。调查选取的样本是“2012 年 5 月年龄为 15~59 周岁之间，在本地居住 1 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调查过程中抽取样本 4 000 个，有效样本 3 994 个。

（一）制度设置与社会融入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假设 1，我们将研究中的“制度设置因素”分为 5 个方面：居住许可制度、工作制度、住房安排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子女就学制度。具体来说包括：居住许可制度。用是否持有有效暂住证/居住证来加以界定，以持有暂住证/居住证为参照，设置“未持有暂住证/居住证”、“不清楚是否持有暂住证/居住证”2 个虚拟变量；工作制度。包括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两个维度，工作时间用每周工作的天数来加以界定，以工作 5 天为参照，设置“不到 5 天”、“工作 6 天”、“工作 7 天”3 个虚拟变量。工作强度以



每天工作时间加以界定,以工作 8 小时为参照,设置“不到 8 小时”、“8~10 小时”、“10 小时以上”3 个虚拟变量;住房安排制度。以被调者目前住房性质作为判断标准。以租住或借助房为参照,设置“政府提供廉租房”、“单位提供住房”、“自购房”、“自建房”、“其他非正规居所”5 个虚拟变量;医疗保险制度。询问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以享有医疗保险为参照,设置“不享有医疗保险”和“不清楚是否享有医疗保险”2 个虚拟变量;子女就学制度。通过询问是否缴纳赞助费和学校性质两个维度为主要判断依据,前者以“未在本地就学/无子女不适用”为参照,设置“缴纳了赞助费”、“未缴纳赞助费”2 个虚拟变量,后者则以“未在本地就学/无子女”为参照,设置“公立”、“私立”和“打工子弟学校”3 个虚拟变量。虚拟变量的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在具体分析时,为避免个人信息变量对制度设置的解释项形成干扰,首先要确定这些个人信息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学历、收入、职业、户口性质、在本地时间、个体幸福感等)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逐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剔除不相关因子之后,发现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流入时间、个体幸福感等几方面因素与一组或多组因变量存在关系(或其中的某些虚拟变量与因变量有关系)。在建立制度效应的回归解释模型时,这些因素将作为协变量进入模型,以确定制度性因素在解释过程中与它们是相互独立的。表 3 给出了制度效应的多元回归模型方程结果。

可以看出,制度因素在 3 个模型中的解释力各有不同,它与个人信息变量一起,分别解释了 3 个模型的 15.5%、6.6%和 11.9%。在验证假设方面:

1. 居住许可制度与流入者的融入意愿和融入体验有关。“未持有暂住证/居住证”变量在模型 1、模型 2 中的系数为-0.066 和-0.097,

这说明与持有暂住证/居住许可证的流入人口相比,没有相关居住许可证的居民融入本地的意愿和融入过程中的体验感知都要低一些。这大部分验证了“是否拥有居住许可证/暂住证与流入人口的社会融入感呈现正相关”的假设。但是否持有相关许可证对深化融入决策因子影响不大。

2. 工作制度与流入者的融入意愿和深化融入决策存在相关性。其一,所在单位的高负荷工作强度与融入意愿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超过正常工作负荷(每天 8 小时)之后,工作负荷越高,社会融入越低,“每天工作强度超过 10 小时”的回归系数达到了-0.24,说明此类流入人员的融入意愿要远远低于正常工作强度的流入人员的融入意愿。其二,较短的工作时间与深化融入决策存在正相关。“每周工作时间不到 5 天”的流入者希望进一步加深融入的可能性更高。但工作制度设置与融入体验关系不大。

表 2 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描述

变量	均值	方差	
是否持有暂住/居住证 (以持有为参照)	未持证 不清楚	.5038 .0186	.250 .018
每天工作几小时 (以工作 8 小时为参照)	8~10 小时 10 小时以上 不到 8 小时	.2994 .1437 .0386	.210 .123 .037
每周工作几天 (以工作 5 天为参照)	不到 5 天 6 天 7 天	.2950 .1340 .5393	.290 .116 .249
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以享有为参照)	不享有医疗保险 不清楚是否享有医疗保险	.8578 .0265	.122 .026
子女就读学校性质 (以未在本地就学或 无子女不适用为参照)	公立学校 私立 打工子弟学校	.359 .0130 .0040	.143 .013 .004
是否缴纳赞助费 (以未在本地就学或 无子女不适用为参照)	缴纳过赞助费 未缴纳赞助费	.0255 .2764	.025 .200
您的住房情况 (以租住或借助房为参照)	单位提供住房 政府提供廉租房 自购房 自建房 其他非正规住房	.0663 .0020 .2451 .0125 .0008	.062 .002 .185 .012 .001



表 3 制度效应与社会融入感的多元线性回归^a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量)	-1.899***	-1.207***	-1.305***
性别(女性为参照)	0.049	-0.076*	-0.067*
年龄	-0.003	0.004*	-0.004*
流入时间	0.010**	0.007	0.003
学历 ^b (高中为参照)			
小学	0.204**	0.028	-0.086
初中	0.069	0.075*	-0.063
大学专科	0.177*	-0.121	0.006
信息变量			
职业 ^c (生产人员为参照)			
经商	-0.041	-0.196***	0.097
餐饮	-0.1	-0.281***	0.053
家政	-0.381*	-0.067	0.047
保洁	-0.116	-0.503**	-0.092
其他商业服务业	-0.051	-0.194***	0.052
农林牧副渔	0.306**	0.124	0.114
个人幸福感	0.447***	0.274***	0.381***
是否拥有暂住/居住证(持有相关证件为参照)			
未持证	-0.066*	-0.097**	0.011
不清楚	-0.15	-0.194	-0.008
工作强度(工作 8 小时为参照)			
不到 8 小时	0.11	-0.127	-0.074
8~10 小时	-0.101*	-0.012	-0.037
10 小时以上	-0.244***	-0.008	0.018
工作天数(每周工作 5 天为参照)			
不到 5 天	-0.081	0.043	0.237*
6 天	-0.064	0.043	0.046
7 天	-0.003	0.088	-0.061
制度设置			
在本地享有医保情况(享有医保为参照)			
不享有医疗保险	0.124	0.054	-0.128*
不清楚是否享有医疗保险	-0.353**	-0.18	-0.045
影响变量			
学校性质(无子女或子女未在本地就学为参照)			
私立	0.279*	0.145	-0.258
打工子弟学校	0.571*	-0.887***	-0.243
公立	0.150*	0.034	-0.108
入学是否缴纳赞助费(无子女或子女未在本地就学为参照)			
未缴纳赞助费	-0.155	-0.073	0.174**
缴纳过赞助费	-0.144	-0.105	0.061
住房情况(以租房或借房为参照)			
自购房	0.177***	-0.118**	0.322***
自建房	0.424**	0.152	0.016
其他非正规住房	-0.083	0.182	0.489
单位提供住房	0.081	0.197**	-0.193**
政府提供廉租房	-0.185	-0.127	0.338
R 方	0.155	0.066	0.119
F	18.94	7.553	14.275
sig	0.000	0.000	0.000

注：^{*}p<0.05, ^{**}p<0.01, ^{***}p<0.001; ^a模型 1 :主观融入意愿模型,模型 2 :客观融入体验模型,模型 3 :深化融入决策模型;

^b 学历包括 :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未通过检验的变量已被略去; ^c 职业包括 :国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及办事人员、经商、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装修、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副渔人员、生产人员(参照变量)、运输人员、建筑、其他生产运输操作设备人员、无固定职业人员、其他职业人员等,未通过检验的变量已被略去。



3. 医疗保险制度对流入者的融入意愿和深化融入决策有影响。一方面,不清楚是否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入者的社会融入意愿更低,不清楚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可能意味着对自己在本地的种种情况并不关心,更不可能对城市抱有更加深刻的融入态度。另一方面,不享有本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入者对进一步深化融入的兴趣要低一些。作为最基本的保险制度之一,不能享有此类医疗保险的流入者以后的生活成本无疑更高,这可能降低了他们选择进一步留居或长期居住的意愿。

4. 子女教育制度与流入者的社会融入感存在关系。其一,从入学性质来看,无论子女是在公立、私立或在打工子弟学校入学的流动人口都呈现出比较强烈的主观融入意愿。这说明,愿意将子女安置在自己所在城市的流入者更加渴望融入新的环境之中,而且这一愿望与子女学校情况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子女学校的具体性质却对社会融入体验造成了影响。特别是“子女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与客观融入体验呈现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可能进入这类学校意味着一种“污名”(stigma),是对流入人口“外来打工者”身份的再次确认,从而造成他们内心的消极体验。其二,子女入学未缴纳赞助费的流入人口对进一步融入的意愿更强烈,这可能是因为少了入学赞助费的负担,流入者的留居成本更低,因而做出深化融入决策的可能性就越高。

5. 住房制度与社会融入感的关系没有得到验证。政府或单位为流入者提供住房并没有成为他们提升融入感的推动因素,甚至“是否住单位提供的居所”还与其深化融入决策呈现负相关。与之相对,“自己购房”这一变量与三方面的融入感知因子都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这表明“自己能够拥有房子”而不是“谁为自己提供房子”是融入当地的重要因素。

因此,制度设置影响因素中的 4 个要素——居住许可制度、工作制度、职工医疗制度和子女入学制度与社会融入感之间的相关性基本得到了验证,但住房制度假设被否定。考虑到个人购房对流入人口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大体而言,制度设置对吉林省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影响还是较为显著的。

(二)个体行动与社会融入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假设 2,本文将从 3 个方面讨论个体行动与社会融入感的关系。第一,社会参与行动方面。调查问卷从 5 个方面了解被调查者的社区活动参与情况,这 5 个方面是:社区文体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参与、计划生育协会活动参与、社区卫生和健康教育活动参与、选举活动参与,5 个变量均为“是否型”变量。第二,人际交往行动方面。通过询问“被访对象业务时间在本地与谁来往最多”来确认,以“很少与人交往”为参照,设置“户口在本地的同乡”、“户口在老家的同乡”、“其他本地人”、“其他外地人”等 4 个虚拟变量。第三,回归性行动方面。以“2012 年春节是否回老家”和“过去一年寄回或带回老家合计多少钱”为考察指标。前者是“是否型”变量,后者是连续的定距变量。与制度设置分析时一样,为了避免个人信息因素对个体行动变量解释度的干扰,回归模型中也将它们作为辅助变量加入。表 4 给出了从个体行动视角出发的社会融入感回归分析。

可以看出,从个体行动分析视角建构的模型拟合度略小于从制度设置角度形成的模型。但是由于前者涉及的变量更少,可以认为两者的解释力大致相当。在对假设 2 的验证方面:

1. 社会参与行动对流入者的社会融入感有积极影响。可以看出,除了社区文体活动的作用尚不十分明确之外,调查涉及的各类社会参与性行动都对一方面或几方面的社会融入感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其中,参与选举活动能增强流入者的融入意愿,参加卫生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宣传的活动能够让流入者感受到当地社区对自己的接纳,形成积极的融入体验,参加社会公益和卫生健康教育活动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成流入者的融入决策。这与假设 2.1 基本吻合。

2. 人际交往行动与流入者的社会融入感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正如假设 2.2 提到的那样,人际交往对流入者形成了推拉的二重效应。一方面,回归模型显示,在融入意愿方面,各类人际关系都在



表 4 个人行动变量与社会融入感的多元线性回归^a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量)	-1.732***	-1.328***	-1.537***
性别(女性为参照)	0.037	-0.051	-0.070*
年龄	-0.003	0.004*	-0.003
流入时间	0.017***	0.004	0.006
学历 ^b (高中为参照)			
小学	0.178**	0.057	-0.127*
初中	0.059	0.07	-0.085*
大学专科	0.164*	-0.136	0.007
职业 ^c (生产人员为参照)			
经商	-0.065	-0.136*	0.022
餐饮	-0.170**	-0.179**	-0.07
家政	-0.496*	-0.154	0.095
保洁	-0.16	-0.439*	-0.247
其他商业服务业	-0.053	-0.153**	0.003
农林牧副渔	0.353***	0.166	0.076
个人幸福感	0.449***	0.263***	0.41***
社会参与行动			
社区文体活动	0.023	-0.05	-0.017
社会公益活动	0.025	-0.021	0.105**
计划生育协会活动	0.031	0.108**	0.037
社区卫生和健康教育活动	0.041	0.015*	0.095*
选举活动	0.103*	0.018	-0.023
人际交往行动(以很少与人交往为参照)			
户口在老家的同乡	-0.240***	0.061	-0.039
其他本地人	-0.159**	0.196***	0.016
其他外地人	-0.244**	0.218*	0.12
户口在本地的同乡	-0.274***	0.123	-0.055
回归性行动			
2012年春节是否回家	-0.051	-0.003	-0.054
过去一年寄回老家多少钱	0.000	0.000*	0.000*
R方	0.131	0.061	0.099
F	20.692	8.418	14.28
sig	0.000	0.000	0.000

注：^ap<0.05，^{*}p<0.01，^{**}p<0.001；模型1：主观融入意愿模型，模型2：客观融入体验模型，模型3：深化融入决策模型；学历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未通过检验的变量略去；职业包括：国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及办事人员、经商、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装修、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副渔人员、生产人员(参照变量)、运输人员、建筑、其他生产运输操作设备人员、无固定职业人员、其他职业人员等，未通过检验的变量略去。

促进作用，以自身为中心的人际交往行动对社会融入感有推拉的双重作用，以原居地为中心的回归性行动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本地区的认同和融入。

四、结论和讨论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是在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它是社会融入的关键。本文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社会融入感在结构上包括主观融入意愿、客观融入体验、深化融入决策3个层次，应在这3个层次上加以考量。基于此，本研究以吉林省为例对流入人口的社会融入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和个体行动都对流入者的社会融入感产生影响。从结构制度层面上，户籍与

发挥消极作用，这可能由于他们很容易用对自己人际圈子的认同替代对城市认同的意愿。同时可以看出，这种“替代性认同”似乎已经不仅仅是基于地缘、血缘，还可能在本地甚至外地人身上构建起来。另一方面，与当地居民和其他地区外来人口的互动有利于获得良好的融入体验，提升流入人口的适应性。这种人际交往行动的“二重效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而在促成其融入决策时反而看不出其影响的方向性。

3. 回归性行动对流入者的社会融入感有一定制约。模型表明，春节回迁情况并不能对流入者的现居地融入感产生明显影响，但“每年寄回老家的钱数”与在本地的融入体验和社会融入决策显著相关。由于非标准化系数小于千分之一，故而显示为0，我们参考其标准化系数可知，该变量与后2个因变量因子呈负相关(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33和-0.040)，因此，对本地的融入感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对原居地关注度的影响，但影响强度并不大。

因此，除了制度设置影响之外，流入者的微观行动也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融入感状况。总体来讲，以社会/社区为中心的参与行动对其社会融入感提升主要发挥

居住许可制度、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工作制度、子女教育制度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流入者而言,居住证/暂住证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职工医疗保险和学校制度直接关系到自身就医和子女就学两件大事;单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方面的安排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体验,从而影响着他们对所在地的感知、认同、评价和融入。说到底,制度问题的核心是社会公平,是公民权利的平等和工作权限的保障。只有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居住证制度”,落实国务院关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相关文件精神,保障流入公民与本地公民同等的受保障权,监督企业用工制度,避免流动人口雇佣和劳作过程中的严重异化,改革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机制,让他们得以享受与本地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才能给予真正让流入者愿意融入、能够融入并不断深化融入的宏观制度环境。

从个体行动层面上,流入者的社会活动参与和人际交往过程都对其社会融入感有重要影响,与原居地的互动情况也一定程度上制约其融入感知。这提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者们要特别在促进流入者的社会参与和人际资本积累两个角度上为流入者们提供帮助。要充分利用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平台、社区构建的服务项目与娱乐活动、各类 NGO 组织等等资源,帮助他们接触当地社会、了解当地社会、融入当地社会。流入者自身也应该逐步打破自我保护、自我限制的束缚,走出身边的小圈子,将人际交往作为自我发展的有效路径,而不是作为自我限制的硬壳。

当然,鉴于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流入者社会融入感产生影响的因素还值得进一步探索。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更多的还是从流入者及其所处的结构性制度环境加以考察,那些非结构性制约——包括当地市民对流入人口的态度、市民与流入人口的互动情况、种种潜在的歧视因素等尚未完全纳入研究体系中来,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关注。无论如何,帮助流入人口增强融入意愿,提升融入体验,最终深化融入决策,让流入人口逐步融入主流社会,不论对吉林省的全面发展还是对于流入者本身都有着重要意义。只有从宏观制度与微观行动的综合中,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互动中,从流入人口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才能更好地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实现其社会融入。

【参考文献】

- [1]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 88.
- [2]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1):17- 29.
- [3] 高春风.标签理论视角下流动人口融入城市问题研究[J].农业考古,2011,(6):234- 237.
- [4]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6):107- 122.
- [5] 张展新,侯亚非.流动家庭的团聚:以北京为例[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6):77- 83.
- [6] 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J].地理科学,2011,(3):264- 271.
- [7] 风笑天.“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J].社会学研究,2004,(5):19- 27.
- [8] 童星,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J].社会科学研究,2008,(1):77- 83.
- [9] 黄匡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指标体系构建[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5):52- 58.
- [10] 刘建娥.乡-城移民(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基于五大城市的调查[J].人口研究,2011,(4):62- 75.
- [11] 周皓.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12,(3):27- 37.
- [12]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2009[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58- 59.
- [13] 宋月萍,陶椰.融入与接纳:互动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证研究[J].人口研究,2012,(3):38- 49.
- [14] Moerman, Michael. Ethnic Identity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65,67: 1215- 1230.
- [1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分布和起源[M].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 [16] Gordon, Milton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80.
- [17] Paul Bernard. Social Cohesion: A Critique[R].Ottawa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Inc,1999:6- 7.
- [18] Han Entzinger & Renske Biezeveld. Benchmarking in Immigrant Integratio [R].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2003: 44- 46.
- [19] 任远,乔楠.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10,(2):11- 20.
- [20]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2,(5):1- 24.
- [21] 崔岩.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2,(5):141- 160.
- [22] 郭星华.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05.
- [23] 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感性依恋与理性策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19.
- [24] Alcock,P. Understanding Poverty[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35- 42.
- [25] 李强.户籍分层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8):16- 19.
- [26] 郭星华,姜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J].探索与争鸣,2009,(1):61- 65.
- [27] 刘建娥.乡 - 城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践策略研究——社区融入的视角[J].社会 ,2010 ,(1):127- 151.

[责任编辑 李新伟]

The Structure and Factors of Social Integration Feeling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ANG Sheng-jin, XU Shi-cun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eelings are one of the core issues of social inclus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the structure and impact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feels about floating population in Jilin Province. Social integration feeling is a composite percep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asing on their integration willingness and experience and their deiced of deepening integration. It includes three levels: wish, experience and the decision-making. Then, we exported two factor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feeling: macro-institutional setting and individual actions. On the one hand, whether having a residence permit/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 enjoying medical insurance for workers, allowed their children attending school without a sponsorship fee and experiencing rational working intensity have an effect on their integration feelings; On the other h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ction, interpersonal action and the return of action will also influence these feelings.

Key Words : Jilin Province, inflow of popul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feelings, system settings, individual action